

中国体育博士后文丛

唐代体育 文化研究

國際運動哲學學術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科資大樓9樓國際會議廳
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2日至23日



王贊馨◎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中国体育博士后文丛

唐代体育文化研究

王赞馨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李 飞
责任编辑:赵海宁
审稿编辑:李 飞
责任校对:叶 莱
版式设计:杨 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体育文化研究 / 王赞馨著. --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644-2764-1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体育运动史—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G812.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4512号

唐代体育文化研究

王赞馨 著

出 版: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48号
邮 编:100084
邮 购 部: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010-62989432
发 行 部:010-62989320
网 址:<http://cbs.bsu.edu.cn>
印 刷: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成品尺寸:228×170 毫米
印 张:7.25
字 数:163千字

2018年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定 价:43.00元

(本书因印制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王贇馨，女，1983年3月生，文学博士，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后，吉林体育学院讲师。2001年9月考入吉林师范大学，2005年获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同年到吉林体育学院工作至今；2006年9月和2008年9月，先后于吉林大学师从中国古代文学著名学者孟兆臣先生、沈文凡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并于2012年12月取得文学博士学位。2013年7月，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池建教授，致力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和体育与文学的研究。2014年9月-2015年7月，作为访问学者赴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交流；2016年8月-11月，参加吉林省优秀青年业务干部和骨干教师教学法研修班，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进修。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和体育文学，现已出版学术专著《唐代游艺与诗歌》，主持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游艺体育文化研究》，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唐射猎文化刍议》《唐射猎诗研究》等。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节 古代体育发生发展概述	1
第二节 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缘由	4
第三节 唐代体育开展的时代特征	6
 第一章 唐代体育的表现形式	13
第一节 射 猎	13
第二节 球 戏	15
第三节 角抵与技巧	18
第四节 博 弈	21
第五节 乐 舞	28
第六节 宴会活动	35
第七节 斗 鸡	38
第八节 童 嬉	40
第九节 节俗活动	42
 第二章 唐代体育文化的结构体系	48
第一节 唐代体育的物质文化	49
第二节 唐代体育的精神文化	54
第三节 唐代体育的制度文化	58
第四节 唐代体育的民俗文化	63

第五节	唐代体育的心态文化	66
第三章	唐代体育文化的思想基础	72
第一节	儒家思想的基础作用	72
第二节	佛道思想的推进作用	79
第四章	唐代体育文化的特征	82
第一节	军事体育与娱乐体育并重	82
第二节	唐代体育文化的开放融合性	84
第三节	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性	87
第五章	唐代体育文化的价值	90
第一节	体育文化与唐人	90
第二节	体育文化与唐代社会	92
第三节	体育文化与唐代军事	97
第四节	唐代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99
参考文献		104
后 记		109

引言

第一节 古代体育发生发展概述

“体育”一词是外来语，19世纪80年代由外语翻译而来，最初译为“体操”，意思是身体操练，20世纪初改称“体育”，为身体锻炼和品德培育之意。中国古代体育具有悠久的历史，由早期无意识的、低级的、简单的生存游戏，发展成有意识的、高级的、复杂的、多样的、具有社会属性的娱乐活动，由单纯的物质满足变为深层的精神追求，满足人们生产劳动之外的人性需要，有利于身、心、灵的协调和发展。

中国古代体育的兴起，是原始人类基本生存的需要。体育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与其他文化活动一样，起源于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在为获取基本生存物资与野兽的搏斗中，原始人类从模仿、对抗的行为中获得生存的技能，从与天地沟通的祈祷、庆贺的祭祀行为中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之情，以及克服恶劣环境、气候带来的生存困境的过程中彰显与自然抗争的勇气。这个过程就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发生，是人类从事体育活动的起源。

原始人的体育活动是本能的、非功利的，是为生命和生存的需要，存在于原始人的劳动和祭祀活动中。《吴越春秋》中记载的上古歌谣《弹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1]简单的八个字描述了原始人类制造捕猎工具和捕猎野兽的过程。《淮南子·道应》篇有：“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2]记载了原始人集体劳动的场面，众人扛举大木，口中齐呼“邪许”，类似今天的劳动号子，以调整气息，协调节奏，集中发力，这是最早的将

[1] 郁默（译注）.吴越春秋选译[M].苏州：凤凰出版社，2011：179.

[2]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380-381.

文字、声音、形体统一的简单模式，即在劳动中形成的诗、乐、舞三位一体。《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3]“葛天氏”是远古时期的一个部落首领，这八阕是一套古老的乐曲，有歌有舞，歌辞已经不可考，舞姿极其简单，仅三人手持牛尾，边舞边唱。歌唱内容从题目来推断，“载民”歌唱始祖；“玄鸟”是燕子，可能是部落的图腾；“遂草木”歌唱草木茂盛；“奋五谷”歌唱五谷生长；“敬天常”是遵循自然法则；“建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原始人的敬畏之心。整个充满强烈仪式感的场面是原始人类通过歌舞表达对祖先、对自然、对天地万物的信仰和崇拜，对万物生长、收获的祈祷和向往。

上古神话中塑造了很多英雄形象，他们往往被赋予神的意义，都具有克服一切困难的魄力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创造了辉煌伟大的业绩。如《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4]夸父逐日，是早期人类对自然发起的挑战。这是关于跑步的最早的记载。《淮南子·本经训》载“（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猋獠”，^[5]这是关于“射”的最早记载，可见射之一技，源于原始人类为了生存而与自然展开的抗争，表现出无畏的勇气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体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起源于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生活。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不断经历抗争与妥协。为了保护自己 and 寻找食物，原始人类掌握了狩猎技能，学会了跑、跳、跃、投、掷、攀、爬、翻、滚、搏斗等各种狩猎技巧；为了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崇拜敬畏，对物质收获的兴奋庆贺，原始人创造了乐曲歌舞，“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6]狩猎、跑步、歌舞是人类最早的体育活动形式。可以说，原始体育是原始人类的一种生命活动。

战争亦是体育活动发生的原因之一。原始社会时期，各部落联盟已经为了争夺生存条件而发动了战争，军事训练就成为战争胜利之必须。刘向《别录》曰：“蹴

[3] 许维通（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9：118.

[4]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6:284.

[5]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255.

[6]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

鞠，黄帝所造，本兵势也。或云起于战国。”^[7]不论蹴鞠是否为黄帝所造，其最初发明是为练兵所用，是肯定的。尤其是到了奴隶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8]战争已成为国家除了祭祀之外的头等大事，祭祀是为告禀宗族之兴旺，并求祖先神灵护佑，事神致福，而战争是为保卫国家，扩展疆土。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统治者必须加强军队建设和军事训练，军事体育就此发展起来。

其后，两汉的四百余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盛世时期，展现出蓬勃向上、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体育也彰显出竞争拼搏、神采飞扬的繁荣面貌，内容丰富多彩，蹴鞠、打球、骑射、角抵、投壶和各种棋类活动、节俗活动广泛开展，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许多体育活动在這一时期初步形成体系，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古代体育在这时初具规模。汉末军阀混战，群雄割据，虽然抑制了体育活动的发展，但练兵习武推动了军事体育活动的兴盛。

经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战乱，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人民南迁，出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隋朝一统天下，李氏建立唐朝，一度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百姓生活富足，唐代体育呈现军事训练、运动竞技和娱乐体育活动共同发展的繁盛局面，这一时期的体育娱乐活动主要是活动者亲身参与，体会与享受活动中的乐趣，自娱自乐。

唐代中期以后，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导致国库空虚，政令不行，军权旁落，战乱频扰，人民不堪其乱，终于爆发农民起义，最终国家分裂，政权更迭，后周都检点赵匡胤黄袍加身，武力统一，建立宋朝。宋太祖统一天下后，吸取唐灭亡的教训，回收兵权，加强武器的管理，崇尚“存天理，灭人欲”和“主静”的理学主张，限制军事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开展，宋朝的体育之风整体偏向文弱。《宋史·郭从义传》载：“从义善击球，尝侍太祖于便殿，命击之。从义易衣跨驴，驰骤殿庭，周旋击拂。曲尽其妙。既罢，上赐座，谓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将相所为。’从义大惭。”^[9]宋太祖虽然认为郭从义技艺精巧，但又告诫其打球实非将相所为之事，这与唐代统治者对马球的热爱大相径庭。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官僚地主阶层人数大大增加，社会豪华奢侈之风增长，消费需要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人口激增，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市文化兴起。适

[7] [唐]徐坚（撰）.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67.

[8]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67.

[9] [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8851.

应市民文化需求，城市中出现了专门的表演场所，名为“瓦舍”“勾栏”，也出现了专门的体育表演者。宋代的体育活动主要表现为体育表演，表现的是体育的观赏娱乐价值。

至元明清三朝，元清两朝国家政权由北方少数民族掌握，虽然国力强盛，但少数民族统治时间长，民族文化差别和统治阶级的冷落，使军事体育和体育表演走向衰微。元代刑法严格规定，地方禁止私造军器，宗庙祭祀严禁使用真兵器，以土木纸彩代替，民间禁止制造弹弓，禁止渔猎从业者、捕盗巡马弓手和巡盐弓手之外的人持有弓箭，禁止军队以外的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民间私藏兵器、铠甲及铁制器具，违者按照其持有数量处以鞭笞、牢狱乃至死刑的严重刑罚。^[10]清朝早期也禁止汉人私藏兵器，不允许汉人练习兵器，限制汉人集社。文化的差异也导致原有的体育活动逐步衰退，新的体育项目难以推广，比如清代深受统治者喜爱、盛行一时的冰嬉在北方蓬勃发展，南方却因地域条件所限无法开展。这一时期，追求健身养生的养生体育得到了较大发展。

第二节 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缘由

首先，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是人性的需要。如古代体育活动的发生所述，体育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与其他文化活动一样，起源于原始人类因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劳动和祭祀庆贺典礼、军事训练等社会活动，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进化演变。人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便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体育活动能够供给人自由自在的心灵满足，但同时又有相应的规则束缚，它能够满足人们的休息、娱乐、放松、调适、消遣、竞赛、娱乐等方面的心理需求。

古有“游艺”一词。《论语·述而》有“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所说之“游于艺”，朱熹注云“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行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

[10] [明]宋濂（撰）.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681.

矣。”^[11]其中，游艺有嬉游、娱心遣兴、闲适放松、调适生活的意思，可视为现代“中国体育”的古代形态，现代研究大多用“体育”这一概念。而心存正念，坚守正道，仁德为重，涵泳悠游于“六艺”之中，则能本末兼顾，内外兼修。国学大师钱穆在解释“游于艺”时，说“游，游泳。艺，人生所需。孔子时，礼、乐、射、御、书、数谓之六艺。人之习于艺，如鱼在水，忘其为水，斯有游泳自如之乐。故游于艺，不仅可以成才，亦所以进德。”^[12]这里已强调，艺乃人生所需，游艺过程能享受自由自在的乐趣，不仅训练人的才能，更能提高人的品德修养。《礼记·学记》中有：“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13]其中言明六艺的兴盛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学习要劳逸结合。

其次，古代体育活动充实了人们闲暇的空余时光。体育活动因原始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而发生，又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物质的极大满足而发展兴盛。林语堂先生曾说：“若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娱乐，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好像对于个人，我们若不知道他怎样消遣闲暇的方法，我们便不算熟悉了这个人。”^[14]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人们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时如何利用闲暇时间能够展现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趣，是人在工作之余调适情绪、陶冶心性的休闲方式。《论语·阳货》有“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15]孔子认为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的人是最难教化的，玩玩掷彩下棋的游戏也比什么都不干要好。

人在满足生存需要之后，也要追求身体和心理上的其他种种不同需求，于是参与各种体育活动，也创造出各种各样引人入胜的体育活动形式，比如雅致静心又宛若战场的围棋、象棋，争夺竞赛、娱乐健体的蹴鞠、马球，雄健豪放、驰骋角逐的射猎，技艺高超、精彩绝伦的技巧表演，百舸争流的竞渡比赛，刺激惊险的斗鸡，等等。这些体育活动是人在闲暇生活时，不可或缺的游戏，而这些游戏虽然会受到时空环境的限制和影响，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充实人的生活，满足

[11] [宋]朱熹.四书集注[M].上海：世界书局，1937（民国二十六年）：42.

[12] 钱穆.论语新解[M].成都：巴蜀书社，1985：160.

[13]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33.

[14] 林语堂.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99.

[15]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1240.

人的需求。“即便在战争逃难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孩子们依然设法玩着自己的游戏。没有游戏的生活是不堪想象的，因为人类的天然本性是不容抹杀的。”^[16]

所以，体育活动一方面源自人性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充实闲暇空余时光。体育是在自愿、自觉、自由意识下的活动，其目的是排忧解难、休闲娱乐、舒缓压力、调适身心、放松自己、享受乐趣，其产生的愉悦、刺激、竞争、紧张、好奇等不同心理状态能够满足不同人的心理需求。

古代体育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在社会经济、政治、民俗、生活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下，满足人们身体、心理和精神的需求，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渐渐融入生活，在人们生活中起到强身健体、调适舒缓、娱心遣兴的作用，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第三节 唐代体育开展的时代特征

纵观中国历史，体育从原始社会作为人们生存手段的无意识的身体活动，到春秋战国时军事色彩浓厚的训练活动，至先秦两汉初具规模。隋唐两朝是我国封建历史上一个大发展时代，尤其是唐帝国不但结束了魏晋六朝三百多年来的混乱局面，而且恢复甚至超过了两汉的景象。唐朝立国近三百年的时间，基本上维持了长期的和平稳定，治世清明安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繁荣富庶，文化兼容并包，人民生活安稳，一度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繁盛局面。这些都为当时的体育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制度严密，社会安定

随着隋文帝杨坚取北周而代之，在北方建立隋朝，又南下灭陈，结束了中国自西晋末年以来二百七十余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大一统王朝。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政权，隋文帝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进行了不少改革。政治上，加强中央统治机构和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巩固中央集权，废除九品中正制和士族门阀制度，积极推行科举制选用人才，沿用北周的府兵制，寓兵于农；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因此，在隋初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这些举措一方面巩

[16] 陈连山.游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7.

固了他的统治，一方面也给后来李渊建立唐帝国打下了基础。

唐代立国后，秉承隋制，中央设三省六部，统治机构更加完善，组织更加严密，具备了相当完整的统治阶级国家机器。唐太宗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增修法典，缓和国内矛盾，开放政权，笼络人心，维持社会秩序；对外通过武力的震慑和文化的交流，与他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有唐一代，较之隋朝极盛之时，人口大幅增殖，从中就可看出统治者与民休息，人民生活安稳，社会安定。《通典》载：“炀帝大业五年（609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17]而唐代人口最鼎盛时，据《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记载：“是岁，户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千五百三十八，乡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18]一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近七百万，国家安定，政治清明，人们得到休养生息，才能够促进人口不断增殖。

社会的安定，使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有了可能，居安方能求乐，只有长期生活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才能工事之余，闲暇之时，以体育活动遣怀取乐，放松身心。

二、农业发展，经济繁荣

自李唐建国并逐渐一统天下，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百多年来，政治清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繁荣富庶，形成“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的盛世局面。

自建国之初，唐朝统治者就十分重视经济，《旧唐书·食货志》载：高祖“既平京城，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未及踰年，遂成帝业。”而后“掌管财赋者，世有人焉……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得其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貽患与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19]在统治者的这一政策下，出现了许多“便时利物，富国安民，足为世法者”的专门人才，经济秩序逐步稳定。

在经济上，唐代统治者尤其关注和提倡农业生产，完善了租庸调制，轻徭薄赋，从贞观初到开元年间，经济大幅增长，人民衣食有余。《新唐书·食货志》载：

[17] [唐]杜佑（撰），王文锦，王兴，刘俊文，等（点校）.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147.

[18]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929.

[19]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86.

“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20]又载，开元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21]从贞观初到四年，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人面生活富足，门不闭户，马牛遍野。至开元年间，米价较贞观四年翻了近三番，可见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开元天宝年间，唐代经济和社会状况达到极盛状态，《元次山集》卷九“问进士第三”云：“开元天宝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22]元结描述此盛世，山野荒田全部开垦，百姓家中的粮食储备可以满足数年所需，官府的粮仓更是堆积了大量粮食，甚至腐烂之多都难以估量，可见当时社会经济之昌盛，人们生活之富足。《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年）”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间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23]这一时期的盛世景况，杜甫诗有记载，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道出了开元盛世，稻粟满仓，物资丰盈的情景。

由于农业的发展，社会经济基础相当巩固之后，自然便会刺激到工商业的发展，如纺织业、炼铁业及造船、开矿等，相应地也就增加了交易往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加强了城市交通。“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斗米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24]又说“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25]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农业、工商业、交通业都很发达，往来商旅很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市的兴起和繁华，比如长安、扬州等。当时国内交通以长安为中心，主

[20] [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46.

[21] [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46.

[22] 杨家骆（编）.新校元次山集[M].台北：世界书局，1984（民国七十三年）：140.

[23]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919.

[24] [唐]杜佑（撰），王文锦，王兴兴，刘俊文，等（点校）.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149.

[25] [唐]杜佑（撰），王文锦，王兴兴，刘俊文，等（点校）.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152.

要线路，东可至山东，北达北京，南通江西，西到凉州、成都等地，自凉州再往西，又可通西域诸国，再加上海上运输，所以有许多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交往。大都市里还出现了许多各行各业的组织，所谓“行会”。交易方式也多样化，不但可以用现钱，还出现了一种“飞钱”，类似后来的汇兑，给商人交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物质的极大丰富，为体育活动的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经济的富足自然使上自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的娱乐群体有更多的财力用于体育活动。农业飞速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空前发达，唐代的纺织业、冶铸业、陶瓷业、造纸业、造船业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交通业的发达，加强了国内和国际贸易沟通和文化交流。以上种种都对体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体育器材加精致，服装更加华美，场面感更加盛大热闹，体育项目更加丰富，文化更加多元。

三、兵农合一，以武选材

军事上，唐初政府沿用府兵制。府兵制度，起于西魏而盛于唐。“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26]府兵制寓兵于农，即军队在和平时期照常从事农业生产，闲时练武，战时则迅速集结出征。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五月，诏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悉依旧式”^[27]，唐朝因袭隋制，这一措施在唐初有效实行，减轻了朝廷负担，成为初唐盛世的重要政策举措，“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畜材、待事、动作，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28]兵农合一大大推动了军事竞技类体育活动在民间的普及和开展。

唐代府兵制的兵士选拔十分严格，“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曰：‘诸兵士将战，身貌庭弱，不胜衣甲。又戎具所施，理须坚劲，须简取强兵，并令试练器械。兵须胜举衣甲、器械须彻札陷坚。须取甲，试令斫射，然始取中。’”^[29]可见，唐代

[26] [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24.

[27]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5529.

[28] [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23.

[29] [唐]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3790.

选兵对身材、体魄、力量、武功等各方面素质的要求都很高。而其考察的主要内容就是骑、射之术，担负护卫天子之责的禁军，自是其中最。据《新唐书·兵志》记载，高祖初定天下，有愿留宿卫者三万人，是为“元从禁军”，父子继之。到“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至贞观十二年，“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其法：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复择马射为百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骏马，虎皮鞞，为游幸翊卫。”^[30]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将府兵中的越骑、步射设为左右羽林军，武后改“百骑”为“千骑”，中宗又改为“万骑”，至玄宗时，改为左右龙武军。可见，在皇家军队建设上，从自愿到选拔，从“百骑”至“千骑”又到“万骑”，从禁军护卫至羽林军，再到龙武军，无论是武艺要求、军队数量，还是权力职责都大幅度提升。

自高宗武后时，随着均田制的打破，农民失去了土地，府兵制逐渐被破坏，府兵逃逸的现象时有发生，“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31]天下承平，久无兵事，府兵卫士以农不能谋生，遂有亡匿。虽然还没有显示出严重的危机，但百姓为府兵所苦，避之唯恐不及，“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浸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爨手足以避其役。”^[32]至玄宗开元十年，府兵制首被废止，“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招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33]府兵制度下，男子成年即从军，至六十岁方免其役，家中人口还要服各种徭役杂役，百姓生活贫困，不堪其苦，纷纷逃亡，故玄宗接受张说建议，招募宿卫，开元十三年（725年）改称彍骑，兵农始分。因是以厚利引诱逃亡府兵中有军事武功的人，所以组成的军队还是颇为精良的。

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开设“武举制”，“春，正月，乙酉，初设武举”，胡作注曰：“武举之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翘关、

[30] [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30-1331.

[31] [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26.

[32]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7471.

[33]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753.

负重、身材之选”，^[34]七等阅人，以技勇选材，重点是骑射。又曰“武举之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唐六典》曰：‘武举以七等阅人：一曰射长垛，试射长垛三十发不出第三院为第，入中院为上，入次院为次上，入外院为次。二曰骑射，发而并中位上，或中或不中为次上，总不中为次。三曰马枪，三板四板为上，二板为次上，一板及不中为次。四曰步射，射草人中者为次上，虽中而不法，虽法而不中者为次。五曰材貌，以身长六尺已上者为次上，已下为次。六曰言语，有神采堪统领者为次上，无者为次。七曰举重，谓翘关，率以五次上为第。皆试其高第以名闻。’”^[35]通过这些项目考核取录的士兵都是体格强健且有武艺的。武举对于军事体育和武术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统治者的军事政策，推动了体育活动的发展，尤其是普及了骑射等军事体育活动在民间的开展和兴盛。

四、兼收并蓄，有容乃大

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唐代文化表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不仅在对内政治上广开言路，在外交上也广泛吸纳，多面融合。

唐帝国初建时的主要外族威胁来自东突厥，唐太宗时国力强盛，兵强马壮，开始反击，贞观四年（630年）大破东突厥，自此原东突厥属国归顺唐朝，北方边境得以安宁，也提高了大唐帝国对外的威信。高宗显庆二年（657年）打败西突厥，与吐蕃、高丽等国也有过战争，这些尖锐复杂的斗争，刺激了国际间的交流，在来往接触过程中，加强了贸易合作，丰富了彼此的文化生活，也为以后的交流打下了基础。

唐朝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十分开明，这与李唐皇室本为鲜卑化的汉人，受胡人文化的影响很深有很重要的关系。唐太宗曾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36]又有“自

[34]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558.

[35]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558.另见于《唐六典》，[唐]玄宗李隆基（御撰），[唐]李林甫等（奉敕注）.大唐六典[M].刻本.正德十年序重刊本：卷五页十二.

[36]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215-6216.